

第六章 合浦地区南越国时期社会文化的整合

——以南越国墓为中心的考察

本章三节，分别扼要讨论合浦南越国墓的居民族属和社会身份、合浦南越国墓所反映的居民人文民俗与生计方式，以及海外贸易及交通线路等问题。

第一节 居民族属和社会身份

通过分析双坟墩 D2 及文昌塔一期墓葬所反映出土的文化因素，并结合文献记载，推测南越国时期合浦地区的族群主要为本地越人，另还有少量其他越族和汉人。

先秦时期，“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而“今之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南海、日南，皆粤分也。”^[1]可见，岭南七郡包括合浦，直至汉代都是越人的聚居区。文昌塔第一期 64 座墓葬，除 9 座无随葬器物外，其中 36 座随葬器物主要为瓮、罐、折肩罐、杯、联罐、甑、匏壶、三足罐、三足盒、釜和提筒等地域特色明显的器类，不见汉式器，且这 36 座中有 30 座为窄土坑墓。这类墓葬在广州汉墓同期亦有发现，发掘者指出墓主应为当地土著民族^[2]。

除本地越人外，合浦南越国时期还有少量其他越族居住，有迹可循的是南越和吴越。在这些地域特色明显的器物中瓮、联罐、甑、匏壶、三足罐、三足盒、提筒等与广州汉墓同期出土的器物十分相近，体现出浓郁的南越文化因素。“南越”一名最早见于汉代，主要指以珠江三角洲为中心的越人集团^[3]，合浦临近该地区，两地西汉早期都流行几何印纹和刻划纹陶器，纹饰多见方格加各类戳印纹等。从出土南越式器的种类、数量判断，西汉早期合浦受南越文化因素影响较强，与南越中心地区交流十分密切，不排除墓主有来自南越的可能。双坟墩两处土墩墓则体现出吴越文化因素，D2 一墩多墓的形制及出土的陶甑、杯等均与江浙土墩墓几乎完全相同，推测墓主应为江浙越人后裔，因战乱或其他因素南迁至此^[4]。

此外，南越国时期合浦应亦有少量汉人。有关汉人南下与越杂居的记载，自秦已有。如秦始皇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适遣戍（徐广集解曰：五十万人戍守五岭）”；三十四年“适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及南越地。”^[5]《史记》又载尉佗“使人上书，求女无夫家者三万人，以为士卒衣补。秦皇帝可其万五千人。”^[6]从文昌塔一期墓葬出土器物看，其中 19 座出土有鼎、壶、铜镜、铜削刀、铁锛、纺轮等汉式器物，且多为宽土坑墓。这类墓葬虽同时出土越式器，但不排除墓主是汉人的可能。

[1] 班固：《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中华书局，1962年，第1630页。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州市博物馆：《广州汉墓》，文物出版社，1981年，第457~458页。

[3] 郑君雷：《西瓯、苍梧与南越》，《庆祝张忠培先生八十岁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14年。

[4] 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广西合浦县双坟墩土墩墓发掘简报》，《考古》2016年第4期。

[5] 司马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1963年，第253页。

[6] 司马迁《史记》卷一一八《淮南王传》，中华书局，1963年，第3068页。

第二节 人文民俗与生计方式

文昌塔一期墓葬共出土各类器物 276 件，为研究汉代合浦地区居民的生计方式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一、农业、渔业

合浦气候为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气候炎热湿润，适合农作物生长。县境北部为丘陵，南部为台地和滨海平原，中部为南流江冲积平原。岭南地区以稻为主要粮食作物，合浦虽未发现西汉早期的稻类残存物，但西汉中期起合浦开始出土用以储存粮食的陶仓模型，西汉晚期至东汉陶仓普遍流行；部分陶屋中常见人俑持杵舂米、持簸箕簸米状劳作的造型，应是为稻米去壳。西汉晚期堂排 M2 内还发现保存完好的稻谷；在风门岭 M24B 出土陶仓中都残存有风化的稻米，可见较完整的稻壳，无法判别属粳稻或籼稻品种。这反映出西汉早期合浦地区粮食储存的客观性。农业的发展离不开各类生产工具，文昌塔一期墓葬出土铁耜 2 件、铜斧 2 件。耜是汉代使用最普遍的农具之一，可用来翻土、理埂、挖掘等，可见南越国时期铁农具已运用于合浦地区农业耕种。

除农业外，由于天然优良的自然条件，合浦地区近海且境内有包括南流江在内的大小河流，捕获各类水、海产品较为容易，以此为食物应很自然。1988 年环城乡母猪岭 M1 出土的陶罐和九只岭 M6A 出土的四系罐中有鲍科贝壳，九只岭 M6B 也出土蚌壳。此外，风门岭 M26 出土的铜鼎残留有鱼骨，经鉴定有两类，其一为鲷科的鱼，另一为鲷鱼。草鞋村汉城址还出土 20 余件网坠，是当时渔业活动的实物证明。这类蚌、贝类和鱼等各类水、海产品，推测早些的南越国时期，也是汉代合浦居民的食物之一。南方气候温暖多雨，盛产水果，亦可作副食，如堂排 M2B 出土铜锅内有荔枝，堂排 M2A 小铜盒内有杨梅。

二、采珠业

合浦本地越人在西汉早期已有采珠业，《异物志》记载：“乌浒、南蛮之别名，巢居鼻饮。射翠取毛，割蚌求珠为业。”^[1]，乌浒、南蛮为汉代史籍对越族的称谓。汉代合浦采珠业如同盐铁等为官营行为，由政府控制市场，由于采珠业有巨大的经济利益，严格禁止官员参与民间贩卖。景帝后元三年（公元前 141 年）颁布一份诏书，“吏发民若取庸采黄金珠玉者，坐赃为盗。”^[2]《异物志》中也有记载，禁止民私自采珠“合浦民善游采珠。儿年十余岁，使叫入水。官禁民采珠。”^[3]两广南越国时期的墓葬仅南越王墓头箱漆盒内出土有珍珠，未加工；墓主头套下为丝囊珍珠枕。推测可能为南珠^[4]。不排除为合浦地区向南越国进贡或通过合浦从海外输入的可能。

三、手工业

从出土的陶器和铜器看，南越国时期合浦居民已具备较为成熟的陶器和铜器制作技术。

文昌塔一期出土陶器 220 件，占随葬品的 80%，属岭南地区硬陶系统。主要为带浓厚地方色彩的日用生活用具。陶质以灰白胎硬陶为主，亦有少量红色和淡红色薄胎软陶。生活用具类器物制作考究，多施釉，纹饰以拍印纹和刻划纹为主，有方格纹、方格纹加曲线形、圆形戳印纹以及篦点纹、细布纹、栉齿纹、弦纹和柿蒂纹等。瓮、罐等体型稍大的圆形器皆泥条盘筑，慢轮拍打，器底后加，钮、耳等附件多另外模制或捏塑成形后贴上。与中原等地出土的青铜器相比，合浦地区出土青铜器多为小型日常生活用具和少量兵器，器形较小，胎较薄，应为本地制作。

另外，从出土的纺轮和西汉晚期风门岭 M26 出土的麻布可知，西汉早期合浦纺织技术已有一定的发展。合浦暂未发现早期丝织品的痕迹，但同期周边中心地区纺织水平，从出土的遗物来看，发展相对成熟。如南越国中心地区的广州，发现有织物，如南越王墓残存的炭化织物，经鉴定有麻布，墓主身穿的丝缕玉衣用麻布作衬里，还有麻袋用来包裹随葬器物。南越王墓西耳室出土较多丝织品，品种丰富，原匹织物多层叠放，厚 20-30 厘米；部分铜器、玉石器、铁器等用丝绢包裹；广西贵县罗泊湾一号墓发现一批木质纺织工具，有翹刀、纬刀、卷经板、吊杆、绕线棍等，墓葬出土的从器志记载有大量丝织品。

[1] (东汉) 杨孚：《异物志》，《艺文类聚·卷八十四》，广东科技出版社，2009 年，第 2 页。

[2] (汉) 班固：《汉书·景帝纪》，中华书局，1962 年，第 153 页。

[3] (东汉) 杨孚：《异物志》，《艺文类聚·卷八十四》，广东科技出版社，2009 年。

[4]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东省博物馆：《西汉南越王墓》，文物出版社，1991 年，第 218 页。

第三节 海上贸易与交通线路

吕思勉认为“则秦汉未并南越时，中国与西、南洋久相往来矣。是知民间之交通，必先于政府”^[1]。南越国时期合浦地区已经开展的海外贸易活动是《汉书·地理志》明确记载合浦为汉代海外贸易始发港口的历史基础。

一、南越国的海上贸易

汉武帝灭南越国之前，南海的一些特产就早已为内地所认知。比如，成书于战国末期《荀子》一书“王制篇”中就明确记载：“南海则有羽翮、齿、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国得而财之”；成书于西汉早期的《淮南子·人间训》亦提及秦始皇“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玕”，而发兵攻打南越。《史记·货殖列传》载“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玕、犀、瑇瑁、果布之凑”，至《汉书·地理志》的记载，物产种类还多了“银”和“铜”，曰：“（粤地）处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玕、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会也”。

南越国时期，长安与南海诸国并没有建立直接的交往，上述物产多是通过在番禺等地汇集再辗转运至京师的。自合浦沿南流江，过鬼门关，再溯北流江而上，至桂江、漓江，过灵渠入潇水、湘江，最终可至中原地区。那么，这些物产的原产地又在哪里呢？

“羽翮”，为翠鸟之羽毛，而“翡翠”，与南越王赵佗上献汉文帝“翠鸟千”，“生翠四十双，孔雀二双”（《汉书·南粤传》），应属同类。杨孚《交州异物志》皆载交州有孔雀、翠鸟之属，“翠鸟，似燕，翡赤而翠青，其羽可以为饰”，而“孔雀，人拍其尾则舞”^[2]。孔雀除产自西南滇池、海外条支（西亚古国，在今伊拉克境内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外，“交趾西于县，多孔雀，在山草中。郡内朱崖有之。”可见，今海南岛的朱崖及越南北部的交趾一带，盛产孔雀。

“齿”，“象齿”，当指象牙。“犀”即犀牛，“革”、“犀角”，当为犀牛皮革和角。赵佗向汉文帝进献的礼物即有“犀角十”。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南越献驯象、能言鸟”（《汉书·武帝纪》）。长安上林苑中即有“穷奇象犀”（《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犀、象在两汉交州多有出产，“九真郡都庞县多象，生山中，郡内及日南饶之”^[3]。犀、象也产自东南亚和南亚，《汉书·地理志》有位于今印度东南的黄支国贡献生犀牛的记载，1975年西安薄太后（崩于公元前155年）南陵丛葬坑出土的犀牛骨骼，经鉴定为爪哇岛的独角犀^[4]。

“珠玕”和“瑇瑁”是产自海中的珠宝。“珠玕”亦即明玕，为合浦所产，是蛤蚌体内的钙质结晶物^[5]。此种应包括珍珠，在当地采珠业兴起的西汉早、中期，汉王朝权贵阶层对珍珠的欲求，还须通过海外贸易输入而获得满足。西方珍珠巨大明亮，《汉书·地理志》中记载的“大珠至围二寸以下”，按汉尺折算，周长二寸的直径接近1.5厘米。西汉

早期的南越王墓所出，最大的直径达 1.1 厘米，从海外辗转输入的可能性较大。玳瑁也生在海洋深处，背甲黑白斑文，相错而成，可以用来制作精美的装饰品，故汉代的著名诗篇《孔雀东南飞》中就有“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的诗句。

至于“果布”，应为龙脑香。汉时苏门答腊、马来半岛、婆罗州等地以及波斯都盛产龙脑香，已辗转输入中国。《史记》下注有裴骃《史记集解》引韦昭对“果布”的解释，曰：“果谓龙眼、离支（荔枝）之属。布，葛布。”^[6]龙眼、荔枝难于运输，葛布也属寻常之物，断不会从南洋长途输入，故韩槐准“断为古人重视而迷信之龙脑香，或非过言”^[7]。按当时的海上交通和贸易情况，南越国的香料来自东南亚各地，应无太多歧义，而熏炉的广泛出现，意味着香料当地已较为普遍使用。孙机先生亦认为，汉代南方的熏香习俗较北方为盛，中原地区熏炉的出现也相对晚一些，反映熏香的风气是自南往北逐步推广的，而高级香料最先是来自南海输入我国的^[8]。

有关南越海上交通的考古资料已发现不少，重要的有镂空铜熏炉、象牙、犀角模型、琥珀珠以及南越王墓出土的乳香、圆形银盒和金花泡饰。这些器物，大都发现于广州，贵港、梧州以及与南越国相邻的长沙等地也有部分出土，在当时的中原地区则较为罕见，应为海外直接或间接的贸易所得。

二、海上交通线路

上述域外物产，多产自南海诸国和南亚一带，其传入路线，无疑是通过海路。《汉书·地理志》中把“遣黄支国，令遣使献生犀牛”置于海上航线中叙述，更证实了这一点。

古代的海外交通有东洋航路和南洋航路。南洋航路上，“习于水斗，便于行舟”的越人，与东南亚、南亚诸国的交往由来已久，至晚到新石器时代，“有肩石器在珠江三角洲发源后主要循西路南下，进入中南半岛、马来半岛及南亚诸国”^[9]，而且“不晚于铁器时代起，南中国海就一直是世界上最为繁忙的跨区域商贸区之一”^[10]。至秦汉时期，越人经由浙江南部、福建进入岭南甚至到达越南北部的南迁路线，正被土墩墓等越来越多的考古资料证实，其族群的移动轨迹也愈加清晰^[11]。

1975 年发掘的广州秦汉造船工场遗址，证实秦汉之际番禺已拥有相当规模的造船能力和先进的生产技术水平。由船台现存宽度推算，1、2 号船台分别可以建造身宽 5~8 米，载重 25~30 吨的大型木船。这种平底船，吃水较浅，适合内河和沿海岸航行^[12]。据东汉刘熙的《释名·释船》所载，两汉时船体结构除船的甲板、上层建筑“飞庐”外，还有桅、舵、桨、橹、篙、帆、纤绳等^[13]。造船技术的提高，特别是帆的使用，使利用季风的远洋航行成为了可能。

从南越墓出土的有关海外实物资料的原产地来看，这条南海交通航线很可能在南越国时就已经开辟了^[14]。正是到了南越国时期，越人对海洋的不断探索，累积丰富的海上交通

经验，对双方物产和文化有了一定的了解。汉武帝平南越前，也已经注意到番禺对外贸易的存在，故在平定南越后，即派使团沿着民间开辟的航路，出使东南亚和南亚诸国。如果没有南越国奠定的基础，不可能出现“武帝以来”的南海交通盛况。

汉代的船只较小，难以抵御巨大的风浪，故一般是沿岸航行，因此在三国时期开辟跨海离岸的航线之前，从番禺出发，北部湾畔的合浦是海路必经之地。不过，目前在合浦发掘的南越国墓葬，都是小型的土坑墓，相关的海外遗物暂且没有发现。相信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这个缺憾会有所弥补。

[1] 吕思勉：《吕思勉读史札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2] 《太平御览》卷924《羽族部·翡翠》，《孔雀》引《异物志》。

[3] 《初学记》卷29《兽部·象》引《吴录地理志》；《太平御览》卷890《兽部·犀》引刘欣期《交州记》：“犀出九德县”。

[4] 王学理：《汉南陵丛葬坑的初步清理》，《文物》1981年第11期；孙机：《古文物中所见之犀牛》，《文物丛谈》，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285~286页。

[5] 王元林：《秦汉时期番禺等岭南港口与内地、海上交通的关系》，《中国古都研究（第二十三辑）——南越国遗迹与广州历史文化名城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古都学会2007年年会论文集》。

[6] （汉）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第3268页。

[7] 韩槐准：《龙脑香料考》，《南洋学报》第二卷第一辑，1941年，第3~19页。

[8] 孙机：《汉代物质文化图说》，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358页。

[9] 傅宪国：《论有段石铤和有肩石器》，《考古学报》1988年第1期。

[10] Hsiao-chun Hung, Kim Dung Nguyen, Peter Bellwood & Mike T. Carson, 2013. Coastal connectivity: long-term tradmgnetworks across the South China Sea. The Journal of Island and Coastal Archaeology, 8:3, pp. 384-404. 文中提到的铁器时代，自公元前500年的沙莹文化开始。

[11] 富霞、熊昭明：《从广西发现的土墩墓看越人南迁》，《考古》2016年第8期。

[12] 广州市文物管理处：《广州秦汉造船工场遗址试掘》，《文物》1977年第4期。

[13] 刘熙：《释名》卷七《释船》，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22~124页。

[14]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东省博物馆：《西汉南越王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347页。